

雅柯布逊的翻译理论研究

雷丽斯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罗曼·雅柯布逊, 20 世纪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 在语言学、诗学、翻译学领域都有所建树, 是布拉格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也是第一个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引入到翻译中的语言学家, 同时被称为翻译语言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本文以雅柯布逊所著《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一文为基础, 分析雅柯布逊从符号学角度对翻译的分类、翻译中的信息对等、翻译中的语法问题以及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探讨其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 雅柯布逊; 符号学; 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罗曼·雅柯布逊 (Р.О. Якобсон 1896—1982), 俄国和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诗学家, 被称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领袖式人物, 布拉格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1918 年, 他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 之后留校任教两年, 1920 年后移居捷克, 1930 年获得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博士学位, 曾经先后任教于捷克、丹麦、挪威几国。1941 年后, 他定居美国, 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执教。雅柯布逊的研究范围广泛, 研究领域涵盖普通语言学理论、语音学、形态学、语法学、诗学、符号学、心理语言学、翻译学等。

20 世纪,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空前发展。雅柯布逊作为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写过大量有关语言学, 尤其是音位学方面的著作, 与此同时, 他还是翻译理论界著名的专家。1959 年, 雅柯布逊的《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一文发表, 文章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观点和看法。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从哲学和艺术的角度研究, 更多的是把翻译看做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直到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翻译研究才逐渐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俄罗斯翻译理论家费奥多罗夫 (Фёдоров 1906—1997) 指出, 翻译学是语言学衍生出的一个分支。雅柯布逊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这篇文章中提出, 翻译过程应当不断得到语言学的研究。他指出, “实际上在保留意义不变的前提下, 任何一种对话语的转换都是翻译” (Комиссаров 1990: 22)。他是第一个提出从符号学角度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他把翻译理解为“两种不同语符中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认为翻译不应局限在经验层面, 关注语言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强调翻译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他的这篇论文一直被西方奉为经典之作。

本文将从雅柯布逊对翻译的三种分类入手, 解析雅柯布逊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的翻译观点, 探讨其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2 雅柯布逊对翻译的分类

雅柯布逊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中不赞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罗素 (Russell) 认为, 没有人能理解 cheese (奶酪) 这个词, 除非他对奶酪有非语言的认识。也就是说, 人对词义的理解来源于自身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而雅柯布逊认为, 任何一个没有奶酪烹饪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英语单词 cheese, 只要他知道 cheese 的意思是“被压制的凝乳做成的食物”, 对“凝乳”有语言上的了解。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吃过 ambrosia (神的食物) 或喝过 nectar (神喝的酒), 只在语言上认识了 ambrosia, nectar 和 god。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理解这些词, 知道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所以对词义的理解不仅仅来源于自身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 而是取决于翻译(此处的翻译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而是指用同一种语言的一些符号来解释另一些符号)。cheese (奶酪)、apple (苹果)、nectar (神喝的酒)、acquaintance (熟人)、but (但是)、mere (仅仅) 以及任何一个词或词组的意义, 都是一个符号事实, 语言的意义应该赋予代表事物的符号, 而不是这个符号代表的事物本身。语言是最重要、最复杂的符号系统。“没有符号, 意义也不会存在。”(There is no signatum without signum.) 雅柯布逊认为, 无论是研究语言的专家, 还是语言的普通使用者, 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都是把该语言符号翻译成另外更深层次的、具有可替代性的符号, 也可以说是“更为发达的符号”。

在该文中, 基于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雅柯布逊把翻译分为三种不同类别, 分别是: 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际翻译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Якобсон 1953) 语内翻译就是指用同一种语言的一些语言符号来对另一些语言符号进行解释, 直白讲就是“换一种说法”(rewording)。语际翻译指的是用一种语言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符号进行解释, 也就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互翻译。符际翻译指的是通过非语言符号系统的其他符号来解释语言的符号, 例如, 手语、旗语。这种翻译类型的区分和我们传统意义上对翻译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一般只涉及到两种语言之间的互相转换, 而雅柯布逊对翻译类型的划分则反映出了他对翻译的理解, 这种理解不仅仅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转换, 而且还几乎囊括了所有语言和非语言的交际活动。“这样分类的目的在于说明, 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中, 翻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不断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进程中, 无论是本族语, 还是外来语, 都有一个对他人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理解的问题, 也就是说, 能否能用相同的语言中的不同说法、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出原文或原话的内容。”(董广才等 2005: 57)

3 翻译中的“信息对等”

“对等”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英国翻译家 Catford (1965) 提出“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和“语篇对等”(textual equivalence), 美国翻译家奈达 (1986) 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德国翻译家 Koller 提出“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 雅柯布逊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中提出“信息对等”(equivalent messages)。对一个词进行语内翻译时, 通常选用同义词、同义手段或委婉迂回的说法。但是, 同义词通常也不会和原词完全对等。例如, 每一个“独身生活者”(celibate) 都是“单身汉”(bachelor), 但并不是每一个“单身汉”(bachelor) 都是“独身生活者”(celibate)。同样, 语际翻译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信息对等。例如, 英语中 cheese 这个词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俄语中的 сыр, 因为 cheese 可以表示“干酪”, 而 сыр 不行, 在俄语中 сыр 表示“发酵过的、被压制的凝乳做成的食物”。所以, 把一个词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并不是单纯地将一个语言符号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符号, 而是将一种语言符号表示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 简单来说, 就是用信息替代信息。因此, 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中的对等信息。(Якобсон 1953)

“语言翻译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研究翻译中等值的语言与言语单位之间的语义联系，即揭示‘翻译等值’这个概念。”（杨仕章 2005：58）雅柯布逊的“信息对等”理论为当时的翻译学理论注入了新活力，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经验层面，使得翻译研究更加深入。但是，雅柯布逊并未界定“信息”（messages）的界限，它是只包括思想内容，还是既包括思想内容，又包括语言形式。

4 翻译的语法问题

翻译的语法问题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如果译语中没有原语的语法范畴，那么翻译时想要忠实原文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需要借助词汇手段。正如博厄斯（Boas）所观察到的那样，一种语言的语法模式（相对于其词汇库来说）决定着将哪些方面的东西必须要译成译语。例如，为了把“I hired a worker”这句英文准确地译为俄语，就需要补充信息：这个动作是否完成，这位工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因为在俄语中，所有动词都有体，体对偶动词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之分，这就有选择 нанимал 还是 нанял 的问题；所有名词都有性，表人名词有阳性和阴性之分（少数表人是中性或共性的），这就有选择 работника 还是 работницу 的问题。假如问一个英国人，这位工人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毫不相关；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这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问题。雅柯布逊认为，不管选择哪一种俄语语法形式，翻译上述句子时都回答不了我“雇过”（hired），还是“已经雇了”（have hired）的问题，也回答不出“他”或者“她”指特定的一个工人（用定冠词 the），还是泛指某一个工人（用不定冠词 a）。因为俄语和英语的语法模式所要求的信息不同，所以翻译时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因此，一个没有上下文的英语句子可能有一系列的俄语翻译，反之亦然。这样一来，译文就可能失去了原文的某些内容。瑞士语言学 S. Karcevski 曾经作过信息丢失量的对比，得出结论：信息内容越丰富，信息丢失越少。

同样，性这个语法范畴在翻译中也是一个难点。俄语中，表人的阴性名词不能指男性，阳性名词一般不能指女性，只有在只强调人的身份、职业等，而不强调人的性别时，可以用阳性名词来表示女性。人们使用拟人或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解释非动物名词，就会暗示这些词的性别。莫斯科心理研究所（Moscow Psychological Institute）的一项测试表明，俄罗斯人倾向于将一周的每一天拟人化：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是男人，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是女人，这是因为俄语中“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понедельник, вторник, четверг）是阳性名词，“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среда, пятница, суббота）是阴性名词。俄语中还有许多迷信也与性这个语法范畴有关。例如，如果吃饭的刀掉了，就预示着会有男人来做客；叉子掉了，就预示着会有女人来做客。因为“刀”（нож）在俄语中是阳性名词，“叉子”（вилка）在俄语中是阴性名词。俄国画家列宾非常困惑：为什么德国画家将“罪”都刻画成女子。在俄语中“罪”（грех）是一个阳性名词，而在德语中“罪”是一个阴性名词，如果列宾知道“罪”在德语中属阴性，那么他就不会困惑了。就像一个俄国小孩，在读德国故事的时候，发现德国人将“死亡”（смерть，在俄语中属阴性）描绘成一个老头就会非常奇怪（“死亡”在德语中属阳性）。捷克诗人约瑟夫·霍拉在翻译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时，对诗集的名字的翻译束手无策。因为俄语中“生活”（жизнь）是一个阴性名词，所以“生活啊，我的姐妹”（Жизнь — моя жизнь）这种说法在俄语中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捷克语中“生活”这个词是阳性，所以译者无从下手。

5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可否在译文中传达原语的符号意义，而在于能否借助原始意义（及结构）的更改来补偿原语符号和译语符号之间的差异及没有直接表现在语言符号意义中的超语言经验之间的差异。”（Латышев 1988：48—49）

雅柯布逊认为，“所有的认知经验及其分类都可以用任何存在的语言表达”，也就是说，

各种语言的表达能力是平等的，语言之间是可译的。如果出现词汇匮乏，那么人们可以通过外来词、新造词、语义转换或迂回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例如，在西伯利亚东北部楚克奇人的新标准语中，将“表”翻译为“锤击的心”，“螺丝”翻译为“旋转钉”，“粉笔”翻译为“书写皂”，“锡”翻译为“薄铁”，“钢”翻译为“硬铁”。即使是用一些看似迂回的表达法，也并不影响信息的交流，就像俄语中用“电马车”（электрическая конка）来说明一种电动的、与马车类似的交通工具。

诗歌语言是对仗工整的。从句法学、形态学范畴，词根、词缀、音素和音素成分（区别性特征）等成分来说，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意义。由此，雅可布逊指出，诗歌规则不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从它的定义上看，诗歌是不可译的，因为诗歌的韵律是不可移植的，而诗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歌的韵律，所以只能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即语内转换，也就是从诗的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语际转换，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符际转换，就是从一种符号系统转换到另一种符号系统，比如说，语言艺术转换为舞蹈、歌曲、影片或画作等等。也就是说，如果语言形式也表达意义，那么可译性就受到限制。

雅可布逊在文章结尾部分中，对“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即叛逆）这句意大利谚语进行了分析，而后提出疑问，翻译者翻译的是什么信息？叛逆者背叛的又是什么？从而引发了读者思考。也正是这两句发问引发了后续学者从文学和文化层面对翻译的研究。雅可布逊指出，如果把这句意大利语译成英语“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这句就失去了意大利语的全部双关价值，而且从形式上也不像意大利语一样押韵。

6 结束语

雅可布逊是第一个将符号学引入翻译研究的学者，他受皮尔斯的解释符号学概念的启发将翻译分为三类，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虽然这类分法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将一个语言符号的解释分为三类（Baker 1998: 218—220），但是他这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翻译的符号学理论日趋成熟，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翻译的成果颇丰。

雅可布逊提出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翻译，把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阐述，并且将两种语言话语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之后加以归纳，使得翻译研究更加严谨、具有科学性。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语言，所以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是自然的，但是翻译不可能仅局限在单纯的语言转换这个阶段，文化研究层面也不可忽视。除此之外，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只能研究句子及句子以下的语言单位，显然，翻译不是研究一个又一个句子，而是由一个个句子组成的一个系统，即文本，所以这是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一个局限。

参考文献

- [1] Бархударов Л.С.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М].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 [2] 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0.
- [3] Латышев Л.К. Перевод: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практики и методик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М].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8.
- [4]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5]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6]董广才等. 开创性研究 深远性影响——读罗曼·雅可布逊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J]. 辽宁工学院学报, 2005(5).
- [7]杨仕章. 俄罗斯语言翻译学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5).

A Study of Jakobson's Translation Theory

Lei Li-s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oman Jakobson w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lingu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He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linguistics, poe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nd he was the first linguist to introduce Pierce's semiotics to translation. So he is also known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This paper, based 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written by Roman Jakobson, analyzes Jakobson's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information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grammar in translation,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r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Jakobson's translation theory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ts limitation.

Key words: Jakobson; semiotics; translatology

作者简介: 雷丽斯 (1990—), 女, 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17-03-15

[责任编辑: 惠秀梅]